

重要新发现呈现考古研究新成果

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揭晓

本报记者 付裕



屈家岭遗址出土陶器

日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在京揭晓。

专家委员会从30多项考古新发现中,评选出6项入选项目和6项入围项目。四川资阳市濠溪河旧石器时代遗址、福建平潭县壳丘头新石器时代遗址群、湖北荆门市屈家岭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清涧县寨沟商代遗址、新疆吐鲁番市西旁唐时期景教寺院遗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南部建筑遗址等6项成果获得“中国考古新发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表示,新入选的“中国考古新发现”项目时间跨度大、地域范围广,为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材料佐证。

为考古研究提供重要样本

“由于时代久远,旧石器时代遗址的有机物很少能保存下来,一般仅能发现大量石器和少量动物化石。”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所长郝蔚表示。

四川省资阳市濠溪河旧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是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展示人和环境关系方面最清楚、最系统、全要素的遗址。其中一处动物化石遗存,在3.5毫米的长度内,分布着11道长短不一、有一定规律的痕迹。考古队队员与国内外环境考古、动物考古和痕迹学等领域的专家反复研究讨论,认为这种痕迹几乎不可能是自然形成的。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王幼平表示:“对于公众,濠溪河遗址是复原了一个触手可及的远古时代的生活场景,刷新了对旧石器时代社会生

活的认知。”福建平潭县壳丘头新石器时代遗址群位于福建平潭岛,沿海岸山体东麓背风坡地连续分布,包括壳丘头、西管、东花丘、龟山等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指出,平潭岛系列考古发现,加深了对于中华文明海洋性的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周振宇表示:“壳丘头遗址呈现出我国沿海地区年代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史前聚落形态。”

“南岛语族早期人群海洋性、大陆性兼备的特征,符合南岛语族起源于大陆,并向海洋扩散的逻辑特征。”周振宇说。

“在屈家岭遗址发现了最早的有坝的水利系统,标志着史前人类的治水理念从最初被动地防水、御水转变为主动控水、用水,实现了从适应自然到改造自然的跨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陶洋表示。屈家岭遗址位于湖北省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以屈家岭为核心,包括殷家岭、钟家岭、冢子坝和汤湾等10余处地点为一体的新石器时代大型遗址。

近年来,考古学者在这里发现多组因势而建、规模庞大的史前水利系统,并对熊家岭、郑畈两处水利系统展开了详细考古调查。“水利系统的发现,实际上把屈家岭遗址群串联成一个整体,成为实证长江中游文明起源的重要大遗

址。”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戴向明表示。

为考古研究提供珍贵资料

陕西省清涧县寨沟商代遗址出土东亚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双辕车,制作精美考究。出土的青铜车马器、玉器、骨器、漆器与殷墟商王陵文物存在高度相似性,揭示了这一地区与商王朝之间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孙战伟表示,寨沟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解家沟镇寨沟村,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是陕北规模最大的商代中心聚落遗址。

北京联合大学校长、教授雷兴山表示:“寨沟体量巨大的夯土建筑令人印象深刻。在田野考古中总结出的这一区域所特有的‘多崇一体’的聚落分布形态,丰富了学术界对于商文明的形成、模式与特质的认知。”

新疆吐鲁番西旁唐时期景教寺院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的火焰山麓,遗址年代约为唐至宋代,是国内罕见的现存景教遗址之一。中山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研究院于2021年开始联合考古发掘。

中山大学教授刘文锁介绍,由于遗址分布在一座山丘上,先后进行的两次考古发掘,采用“虚拟布方”加“实际布方”的方式,发现了遗址岗顶区的主

体建筑遗迹及山坡上的部分遗迹。考古发掘出土大批重要文物,尤其是多语种文献,其数量达到876件(组),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保存如此完整的遗迹和丰富的文物,为研究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等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考古室研究员郭物表示。

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南部建筑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东镇东南。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对辽上京皇城南部大型建筑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主要发掘了两座大型院落及其主殿、配殿等4座单体建筑,以及回廊、院墙等附属建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汪盈介绍,本次发掘的院落是首次在辽上京皇城内发现的辽代始建的大型坐北朝南的建筑。“结合文献记载,本次发掘的皇城南部大型建筑遗址规模庞大、等级高、位置显赫,可能与重要辽代早期建筑相关。”汪盈表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多年来持续在都城考古的理念与方法上进行探索,为城市考古提供了参照。”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说,在遗址保护的前提下,用有限面积的精细化发掘和关键性解剖,来确认平面布局、营建和使用的时代关系等,丰富了都城考古学的理念。



骆岗机场的前世今生

王正荣 郑慧



随着第十四届中国(合肥)国际园林博览会落下帷幕,这张老照片常常被合肥市民提起,这是博览会会场的前身——骆岗机场。它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在中央电视台天气预报前作为合肥市地标性建筑反复播出,成为一代合肥人的城市记忆。

从机场“华丽转身”为园博会会场,背后还有政协委员贡献智慧的身影……

华丽的转身

繁华散尽,骆岗机场也落入时光的尘埃里。很长一段时间里,骆岗仿佛“隐身”了。地处合肥的地理中央,四周是迭起的高楼大厦、穿梭的车水马龙,唯独不见骆岗的新动作。这片土地到底何去何从?其实,坊间关于骆岗“未来”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歇。在兜兜转转4年后,终于有消息传来——骆岗机场规划不作为通用机场,该片区将打造“骆岗中央公园”的概念也基本敲定。

2017年,合肥市政协专门召开会议就“推进我市通用航空产业发展”进行专题协商。会议通过了《关于推动我市通用航空产业发展的建议》,其中包含了对骆岗机场的重新规划定位,骆岗机场作为曾经的民用机场,航空配套设施齐全,这是合肥市发展通用航空产业的重要基础和支撑。在骆岗中央公园的概念敲定后,骆岗的“复航梦”终于开始起飞。

2020年3月,合肥被确定为第十四届园博会举办城市,选址就在骆岗。2022年,安徽省首批低空试点空域、航线获批。两位笔者携手积极探索骆岗机场与低空产业结合的可能性,用创新思维、全局眼光、精心布阵城市第三种交通生态——eVTOL低空交通生态。

2023年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孙云飞率队调研“加强合肥城市文化功能建设、提升省会文化中心地位”议题;2024年,合肥市政协委员胡迪建议,在抢占空天信息产业制高点、提升合肥市“新三样”发展优势中,骆岗公园在打造全空间无人体系中,要加强空天信息产业规划,构建城市空中交通体系。

岁月如梭,白驹过隙。老照片的背后,有过往的辉煌,有今天的奋斗,其中也闪烁着政协人智慧的光芒!

(作者系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政协委员)

辉煌的昨天

1971年民航上海管理局提出骆岗机场扩建规模拟按二级机场标准进行,作为安徽省局的基地,兼作上海管理局的二线基地。其时,周恩来根据中国民航事业发展的需要,指示中国民航总局再次扩建首都机场,建设备降机场。当时的民航总局以第二次扩建首都机场为中心,同时选择天津、合肥机场为备降机场,场址选定距离合肥市11公里的巢湖北岸岗地的骆岗。

1977年底,合肥骆岗机场建成启用,机场用地4119亩,是当时的全国“八大机场”之一。从初建时期年旅客吞吐量只有2万余人次,到高峰期年旅客吞吐量超过500万人次,骆岗机场历经数次改扩建,不断发展壮大。“那时候,打个车20分钟就到机场。下飞机拖着行李坐公交,半小时也能到家。”方便、快捷是骆岗机场留在许多人心中的记忆。

然而,在近距离见证城市由小到大的发展的同时,骆岗机场也面临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机场处在合肥市老城区和滨湖新区之间的过渡地带,直接影响老城区与滨湖新区的连片建设和开发。机场限高、飞机噪音等,老、旧、破、小成为许多人对合肥骆岗机场的评价;并且随着合肥市大建设的快速前行,人口不断增多,安徽融入长三角的步伐加快,在中国中部地位的迅速崛起,与世界各地的联系日趋紧密,合肥骆岗国际机场已经满足不了客流、货物的运输需求,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脚步,这些使得搬迁势在必行。

2006年,就在合肥骆岗机场升格为国际机场的同时,也迎来了历史的转折点。根据合肥市“十一五”规划,将在该市西北31.8公里的肥西县高

我收藏的两本“西行漫记”

笔者有幸收藏到“复社版”《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并且还有签名:《西行漫记》的签名者是著名电影工作者袁牧之,除了签名,还有用毛笔书写的“题后”;《续西行漫记》的签名者是作者海伦·斯诺本人。

“复社版”《西行漫记》

笔者收藏的“复社版”《西行漫记》由胡愈之牵头翻译,参加者有王厂青、林淡秋、陈仲逸、章育武、吴景松、胡仲持、许达、傅东华、邵宗汉、倪文宙、梅益、冯宾符等12人;《续西行漫记》译者胡仲持、冯宾符、凌磨、席涤尘、嗣斯曛、梅益、林淡秋、胡霍等8人,这些译者都是上海孤岛文学时期“星二座谈会”的成员。

据新华出版社《胡愈之传》记载,“陈仲逸”是胡愈之的笔名;胡仲持为胡愈之的二弟;傅东华、倪文宙、吴景松、冯宾符为胡愈之在商务印书馆的同事;林淡秋、邵宗汉、梅益是胡愈之在《译报》时代的同事;许达是斯诺在中国时的秘书,实际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地下工作者郭达。另有资料考据,王厂青有可能是粟裕的秘书嗣斯曛的化名。

《西行漫记》的出版地是上海,是重要文化中心、港口和工业中心,因此,上海的出版物有较强的渗透力、传播力和影响力。由于复社版图书影响力大,需求量大,《西行漫记》自1938年初版后一版再版(目前可查到有5版),不仅有平装本,还有精装本,《续西行漫记》也是一版再版。

笔者收藏的复社版《西行漫记》为第一版的精装本,1938年2月10日付印2000册,1938年3月1日发行。在书的末页,中国早期著名电影导演、编



1938年上海复社版《西行漫记》,精装,袁牧之签名

剧、演员袁牧之的毛笔写了如下的“题后”。“追求真理,解放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建立一个强大、富裕、人人平等的国家,这就是我们的理想!牧之,一九卅九年六月廿日于抗大。”“一九三九年二月,我于抗大校转回,据说此书经历封锁,险落敌之手,历时三月辗转几个地方达延安,至我读后,已很破旧,固由我保藏。”

珍稀版本贵有签名,更贵有“题后”。袁牧之的“题后”,脉络清楚,有时间,有地点,有经历,特别是有“延安”“抗大”“险落敌之手”“辗转几地方”这样的词语,因而使这册上海复社首版的《西行漫记》更显得厚重,难能可贵。

“复社版”《续西行漫记》

笔者收藏的上海复社版《续西行漫记》,1939年上海出版,第一版,平装本,封面设计与复社版《西行漫记》平装本一

样,红底黑字,扉页有海伦·斯诺赠给原燕京大学学生李敏的赠言:

For Li Min, my favorite student whom I loved much in memory of Yenching days long ago, affectionately, Peg, Nym Wales, New York, Xmas, 1949(赠李敏,你是在燕京大学时最钟爱的一名学生,虽年代久远,但记忆犹新,佩格,尼姆·韦尔斯,1949年圣诞节于纽约)。

李敏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1937年毕业后更名为李慧)兼学生会秘书,在校期间与斯诺、海伦夫妇关系极为密切,共同参与了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和游行示威;1936年夏斯诺去西北访问红军期间,李敏经常到位于北平盔甲厂13号的斯诺居所去陪伴海伦,同床而眠,彻夜长谈。(见李慧:“愿佩格·斯诺重来未名湖畔”,北京出版社《一二九在来未名湖畔》,1985年)。

1949年,李慧与丈夫叶德光(原燕

京大学1930届心理系学生)一同访美,在圣诞节之际,海伦将这本上海复社版《续西行漫记》赠送给她。

新中国时期,李慧长期在外交部门工作。笔者有幸在1985年曾陪同李慧一起会见海伦·斯诺的侄女谢莉尔女士。

“因为这是他们的书”

衡量一本书的文献价值和收藏价值,不仅要看看它的作者、年代、珍稀度、品相、签名、题记等,还要看它的社会影响力。1938年上海复社版《西行漫记》和1939年《续西行漫记》,在近现代中国革命史上的影响,无疑是十分巨大的。

对于这本书的影响,斯诺在专门为上海复社版《西行漫记》写的作者序言中如是说:“这一本书出版之后,居然风行各国,与其说是由于这一本著作的风格和形式,倒不如说是由于这一本书的内容吧。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的记录和解释,那就因为这是他们的书。”

斯诺在《为亚洲而战》一书中,颇为风趣地描述了《西行漫记》的影响力:“抗战爆发后,无论我走到哪里,总会出其不意地在什么地方突然碰到一位年轻人,胳膊下挟着一本未申请版权而偷印的《西行漫记》,询问我如何才能到延安去学习。在一个城市,一位教育委员向我走来,暗地里要求我把他的儿子介绍给延安抗大。在香港,一位富有的银行老板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这使我大吃一惊。望着他儿子周围舒适优雅的环境,我说:‘令郎在那儿要睡土炕,要自己做饭,还要自己洗衣服。’‘是的,那个我懂!’这位教育委员回答说,‘不过,如果儿子继续耽(误)在这儿,他迟早要去为日本人洗衣服!’”

这两册散发着旧书年久的气息、页面因时代久远有些风化和碎裂,不知有多少人读过和传递过的《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凝视着签名者的墨迹,回望那厚厚画面中的风云史诗,那一帧帧照片中的红军将士,更感到今天国家独立富强、人民生活幸福的来之不易。

【作者系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北大)、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高级顾问、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常务理事】

“明灯:从威廉·莫里斯到麦金托什”特开展

本报讯(记者 付裕)“明灯:从威廉·莫里斯到麦金托什”特展日前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行。

据了解,此特展展出了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和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等机构和藏家的共计近200件展品,展现了以工艺美术运动为核心的书籍装帧、插画艺术、家居染织、金属工艺、陶瓷装饰、建筑设计等领域的成就。

此次展览呈现了1851年至1930年间设计史的发展历程——从工艺美术运动到新艺术运动和装饰艺术运动的发展,直至现代主义风格的出现。展览从第一件展品《建筑的七盏明灯》到最后一件展品《走向新建筑》,以建筑实践和建筑理论为底层逻辑线索,展现了工艺美术运动从萌芽到成熟阶段的设计风格演变轨迹。



宋玉云龙纹炉

宋代文玩鉴赏颇为流行,对青铜器研究亦有成果,并出现了仿古青铜器玉器,简称仿古玉器。

玉云龙纹炉以青铜簠为蓝本,但在器型和纹饰上多有变化,通体以“工”字纹为地,上饰游龙、祥云和海水纹,圈足外撇,两侧对称饰兽首耳。

此器内底阴刻清乾隆时期的一首七言诗:“何年庙器赞天经,刻作飞龙殿四灵。毛伯那侯异周制,祖丁父契似商形。依然韞匱闾桑海,所惜从薪遇丙丁。土气羊脂胥变幻,只余云水淡拖青。”末尾署“乾隆戊戌孟秋御题”。

玉云龙纹炉,宋,高7.9厘米,口径12.8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